

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

——华南与西南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纪要

丁培仁

2001年5月2日—4日。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华南与西南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在这里举行。

虽说刚刚步入5月，香港的天气却似内地7、8月份一般热。环形会议堂内略感清爽，光线柔和，气氛庄重。偶尔，思维的火花碰撞，立刻激起热烈的讨论，一如外面的天气，激荡起热浪。

此次会议由于主办单位作了充分的筹备，提交会议的论文有较高的质量，所以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在提交的近30篇论文中，大多数是有关道教的，涉及基督教的6篇，有2篇关于佛教，少数民族宗教4篇，还有6、7篇是关于宗教与美学、艺术和宗教现况的。以时代划分，近当代占了很大比重，约占2/3。在方法上，更注重实地调查。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表明研究者对现实宗教逐渐加大关注。

兹将会议纪要如下：

一、古代区域道教

道教起源于何处，是一个既老且新的问题。在这方面，卿希泰《有关道教发源于四川的几个问题》重申了与“江西说”不同的观点。他指出：道教是在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最早的道派有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因黄巾起义失败后便情况不明，五斗米道却一直传承不绝，并愈来愈强大。故教内外学者均以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间作为道教的开端。因此，道教发源于何处的问题，亦即五斗米道发源于何处的问题。但较早的史书、道书以及其它相关资料的记载，均一致认为张陵是沛国丰（今属江苏）人，创教地方是在四川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北25里处。到元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天师》始提出张陵曾到云锦山修道之说，但并未注明云锦山的所在地。后来明代编撰的《汉天师世家》虽称张陵曾到云锦山炼丹，山因“丹成而龙虎现”得名，但创教地方仍承认是四川鹤鸣山。所以，张陵在龙虎山创教之说，不但提出的时间很晚，且无可靠的文献根据。再者，张陵创教时所设立的二十四治有二十三治均在巴蜀地区，这也表明张陵创教是在四川而不应在江西。

五斗米道为什么发源于四川？论文发言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当时四川地区今文经学的风气很盛和黄老道术的甚为流行。第二，是和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和巫术的盛

行有关。

吕鹏志《试评关于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研究》一文综述了过去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点评、驳议了其中许多观点。除了细密地列举东方说、西南说、南方说、北方说、域外说、具体某地说等等观点之外，他更进一步认为，旧说中的“误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过于夸大了某一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天师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误将晚出的或本不相关的内容当成了早期天师道或地域文化所固有的东西。（三）误将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中的巫术联系起来。（四）将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他认为，天师道的某些要素并非源出某一地域文化，相反倒是后者受了它的影响；其性质与巫觋信仰有质的区别，对后者有根本否定的一面；除了袭地域文化，对后者还有斗争、改造、主导的一面。早期天师道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可以看成民间高级宗教与普通民间宗教的关系。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争议。在积极肯定论文发言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同时，好几位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如：过去学者的研究不可一概否定；除了应当尊重以往较有名望的学者的观点之外，也该重视近二十年来专门研究道教的人的见解；有些观点（如早期天师道反对杀牲血祀，与巫术有别）中国学者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提出来过，只是未引起足够的讨论；等等。

另外两篇论文发言是研讨唐五代区域道士活动的：一篇是李刚《唐绵州道士李荣身世及著作考略》，一篇是张钦《杜光庭在四川的道教活动及其价值》。李荣为唐代道教重玄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考证他的身世有助于唐代四川重玄学的研究。李刚指出，李荣出身于有名的道教世家，为李特、李流之后。至李荣时，族中又有信佛者，而李荣对佛教也颇有研究，并将之融会贯通到道教中去。他活动于长安、洛阳，主要是同佛教论辩，成为“老学魁首”。但他的重玄思想受到佛教中观的影响，特别是初唐盛行的佛教三论宗给其理论启发良多。文章对李荣的文人气质、著述也有所考述。张钦的发言集中在认为，杜光庭在四川的道教活动很典型地表现出宗教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和区域政治、区域文化的相关性，揭示出宗教和区域社会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王岗《明代边境道教宫观与香会组织——兰州玄妙观个案研究》是一篇份量很重的论文，已不限于兰州的玄妙观本身，而实乃扩及西北区域宗教和文化的特质。文末并附诸观庙名一览表，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二、区域性近代道教、民间宗教及当代宗教与文化

关于华南、西南近当代宗教与文化有若干项独立的研究课题。有关道教和民间宗教，黎志添《民国时期广州市喃呒（巫）道馆的历史及其与香港喃呒道教的渊源》旨在从民国时期广州市正一、祈福道馆的调查资料，追溯它们与香港喃呒（俗称“喃呒”）传统的历史渊源。他首先对广东地区火居道士

被称为“喃呒佬”的起源作了探讨，认为广东人以“喃巫”作为火居道士的俗名，是把道士列入巫者的传统，称火居道士为喃巫的流传更应先于喃呒一名。关于喃呒道馆和喃呒道士的实况、民间年间广州市政府两次取缔正一、祈福道馆的事件及其原因和结果，论文作了详尽的论列。文章还认为，1946年中华道教侨港道侣同济会在香港成立“代表重要的历史阶段”，二战后香港（除新界以外）正一道教历史的发展非常明显是承接了战前广州市的正一道教传统。

谭伟伦《粤北韶州乐邑黄圃镇的地方宗教文化初探》借用G. William Skinner的观点，以一个墟市所复盖的范围来研究地方宗教文化。他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之共用的研究方法，一一叙述了黄圃镇的宗族情况和诸般宗教文化，以这种“再拼砌出来的地方宗教图像”，来进一步见证以单纯的“三教”概念形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之不足。指出地方宗教文化包含着佛道成份，还有浓厚的地方独特元素。

“斋[FJF] 龢龢三、少数民族宗教

西南和华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宗教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陈昌文《藏区宗教的社会价值困境》，通过自然观察和调查结果，指出藏区社会的发展状况低于内地，更低于沿海；认为综合发展水平从城市、县镇、乡村逐级递减，局部区域和局部指标甚至停滞倒退，而藏传佛教和苯教的民间影响，与藏区在现代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方向上的低位劣势，成为最重要的两大发展困扰。论文比较了现代的和藏区传统的两种价值，并以价值分析方法，分析了求知、经济、政治、审美、社会、神秘主义六种价值，认为前两种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藏区农牧区社会的主导趋势，而在其他方面，六种价值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低下。他对藏区发展的难题也提出应对建议：产业建构应面向西亚和南亚；并认为“两极发展”不失为较好的战略选择。

关于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张泽洪《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的人类学研究》和郭武《道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变异》是这方面的专论。张泽洪认为：在瑶族道教神灵系统中，三元占有重要的位格，这一特质反映出瑶族社会古老的道教传统。道教授在瑶族社会中衍化为度戒仪式，其理论根据来自早期正一道的教义思想。度戒的十诫内容因瑶族的不同支系而不尽一致，这种变动反映出瑶族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取向。他还认为，瑶族度戒仍保留原始宗教的一些特点，因此瑶族道教又具有与正统道教不同的特质。郭武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考察在云南少数民族流传的道教，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少数民族所信奉的“道教”无论从其所奉神灵和宗教经典，还是从其神职人员的产生及功能等宗教基本因素来看，都仍属道教系统。不过，由于其所新增的内容与汉族传统文化迥异，故很难得到“正统”的内地道教的认同。

此外，巫达就彝族宗教作了专论发言，他的论文题目是《传统宗教与凉山彝族的文化认同》。彝族

是西南地区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巫达着重认为，凉山彝族虽然有四个有差异的土语地区，但维系他们对彝族这个族群的认同，传统宗教起了明显的作用。例如《指路经》以人死后灵魂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为基本观念，这种信仰观念加强了各地彝族的文化认同。文章还介绍了彝族的信仰体系、神职人员毕摩和苏尼的功能等传统宗教的内容。

四、近代区域基督教与佛教

关于基督教和佛教的研讨主要集中于近代，而尤以基督教为多，佛教方面的论文发言也是有关佛教对基督教的回应的专题。

“文字事工”是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一个方面。来华差会的出版印刷机构多集中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上海及沿海一带，西南地区只有寥寥数家。陈建明《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出版机构——华英书局》认为，其中华英书局较具规模，对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华英书局的开设、发展、运作、读者面、发行量及区域、乃至最后归宿作了叙述，最后评论了它的宗教和专业作用。

基督教事业是多方面的。成先聪、陈廷湘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发言《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医疗卫生事业的进程与成就》认为，基督教借着医疗卫生的开路在中国边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开了局面。不仅治愈了数以千计的边民，而且还传播了现代医疗卫生知识，开始改变这些地区落后的生活习惯。在推动边疆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龚仲康《华西南区神学教育概况》则简述了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及云南省的神学教育发展过程，现开放改革后教牧义工培养等情况。朱峰《从华南女院的合校争论看基督教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意义》以近代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合并争论为个案，讨论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女子运动中的特点。他认为，从这一个案可以看到基督教对近代妇女运动的独特意义，并不仅是提供一个角色示范的功能或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实际上，基督教妇女以其自有组织和独特意识形态，摆脱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父权体系的束缚，令妇女能够保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力。

综合论述近代基督教事业的有何除《论基督教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四川社会的影响》一文。该文分考察、创办、发展、巩固、自立五个时期简述四川基督教史，从教会、教育、医疗、出版、慈善、社区、救援七个方面分析基督教在四川社会的工作，并从宗教、文化、政治、经济四个层面评论了它的影响。结论认为：西方基督教事业入川，无疑是推动传教，但的确促进了社会的开发、地方事业的开展，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这种后果较之沿海地区明显得多，成为社会近代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人间觉半月刊》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由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厦门分会主办的一份佛教学术刊物。曾在第二卷第十期集中刊登了多篇回应基督教的文章。何建明、赖品超《从〈人间觉半月刊〉看

近代中国佛教对基督教的回应》就是对于这“相当罕见的现象”作专题研究的论文。文章对此回应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均有所论述，认为：由这一个例所反映的历史情势，不仅是佛教与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相遇，也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由衰落走向复兴的努力。它所代表的，很可能是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派的精神。至于是否代表某一地区的反应，还需要深入研究。

五、宗教艺术与区域文化

宗教与美学、艺术及区域文化也是本次会议研究的焦点之一。有的内容已于前文有所介绍，这里集中简述主要成果。

关于道教美学，有潘显一《早期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与分化——〈太平经〉与〈抱朴子〉美学思想比较谈》。他认为：《太平经》既是汉魏时期中下层老百姓美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中原古代文化中审美文化的宗教化和民众化。《抱朴子》既是学者型学术著作，又体现了上层人士、上层知识分子的神仙道教理想及其美学思想，具有江南文化色彩。两相比较，《抱朴子》既是古代道家美学理想的宗教化，又是古代神仙思想和魏晋美学理想的结合；同时，它既是包括《太平经》在内的早期道教的主流化发展和理论提升，又是早期道教美学意识、美学思想的分化。

道教造像始于北魏，张泽纂《北魏的道教造像》是这方面的专论。研究的二十一道教造像碑多出产于陕西。针对旧有的“佛教影响说”，她认为它们是一个多艺术形式组合的“艺术品”，受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影响。讨论的重点关系到北魏时期道教美术史的几个基本特点。（1）北魏早期道教主神像的样式是以汉代以来西王母的造形为依据的。然而，北魏汉化政策的实施使主神像从西王母的形象演变为“秀骨清相”的风格。（2）在道教造像碑中所展示龙、日月、飞仙的图像与道教的神仙思想结合，创造出一个虚无的神仙世界，起到生者和祖先交流的作用。

黄宗贤《仙佛杂糅、异彩纷呈——神仙方术对早期佛教造像的影响》也对道教造像只受佛教影响的旧说提出疑义。他认为，早期佛教以道术为依托，被完全视同于黄老道术，与此相一致，早期佛教造像也多与中国传统神仙异兽形象相混淆。甚至可以说佛像也是借助于神仙方术而传入中国的。特别是在南方地域出土的早期佛教造像经常与中国传统神仙（东王父、西王母、羽人等）同时出现，或相互混淆，相互代替。自卫协、张墨开创先河之后，佛教艺术才成为独立的宗教艺术。

道教戏剧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陈霞《从梓潼阳戏看道教的民俗化》追溯了文昌信仰的由来，介绍了梓潼阳戏的基本情况，分析了道教与梓潼阳戏的关系。认为这种流行于四川梓潼县及附近的民间宗教仪式剧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融娱神与娱人、劝善为一体。并指出梓潼阳戏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民俗化的道教。

杨曦凡《在传统和现代化中传播的丽江洞经音乐——云南丽江洞经音乐调查报告》和段玉明《洞

经、洞经会与洞经音乐——关于云南洞经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均为洞经音乐专题研究。杨曦凡对洞经音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形成与传播、在纳西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当今的洞经音乐等作了论述；认为它虽然最初是以道教音乐的身份进入丽江地区的，但在历史变迁中逐步转变成为一种含有多元宗教、文化因素在内的音乐文化现象。文章比较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的调查。他指出，今天的“大研纳西古乐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之中；洞经音乐也从最初的娱神为主转为娱人乃至完全的商业化为主。段玉明的发言则主要论述“洞经”的源流、云南洞经会的宗教性和洞经音乐的功能等问题。他认为，《文昌大洞仙经》以《上清大洞真经》作为母本，结合了金元道教的时代转变，并与宋明以降的劝善化俗运动相得益彰，尤其是经过嘉靖、雍正两朝的着力推动，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吸纳别的儒释经典，形成了一个三教合一的“洞经”系统。洞经会是谈演“洞经”的宗教组织，是宋明以降劝善化俗运动的产物。洞经音乐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洞经会的主要宗教仪式；但它受儒家礼乐教化理论影响，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音乐形式，同时成为别的民间道教仪式的辅助音乐。

综观这次会议，可以看出一些特征：一是论文选题的范围较为广泛；二是研究的问题多比较具体，且能注意理论结合实际；三是研究近当代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大比重；四是重视研究方法，尤其是研究近当代问题的更注重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结合运用。总之，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代表们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课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今后这样的会议还应当召开，以扩大研究成果。

在会议举行的前后，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同仁们访问了深圳大学、广州市社科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罗浮山道观、广州市三元宫、广东圆玄道观、香港蓬瀛仙馆、圆玄学院、浸信会神学院、九龙城浸信会、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基督教会宣道堂港澳区联合会等处，受到相关各界人士的盛情款待。（责任编辑：方非）

（上接第75页）

①② 《成唯识论》卷三、卷五，大正藏卷31，第14页、第26页。

③ 唐仲容《佛学指南》第367页，上海佛学书局，1994 6。

④ 《辩中边论》卷二，大正藏卷31，第464页。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选集》卷2，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79 10。

⑥⑦⑧ 《六祖法宝坛经》《佛教十三经》273—27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8。

⑨ B11 B12 B13 B14 《五灯会元》134、371、939、238、1135、539页，中华书局，1984, 10。

⑩皮朝纲《临济禅法、无位真人与禅宗美学》《四川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

B15 铃木大拙《禅问答之悟》第172页。

